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9月1日 (第244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蓝图初现

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印太战略，但拜登政府的印太蓝图已经初现。拜登政府调整了最初对共同国家价值观的强调，以更好地与共同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 中美关系

## 中美之间并非注定要开战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 8 月 17 日登载美国退休四星上将查尔斯·克鲁拉克（Charles C. Krulak）等的文章称，美国和中国注定会在许多方面发生冲突，但一场直接的国家间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历史表明，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一个守成大国时，往往会导致战争，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和独特的情况要考虑。在当今的背景下，有四点理由相信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首先，中美两国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都会很快演变成核冲突。限制美苏冲突的“相互确保摧毁”原则同样适用于中美。国际社会将尽其所能确保潜在的核冲突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其后果从根本上具有跨国性。其次，从历史上看，中国打的是一场持久战。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太危险了，中国不会这么做。然而，美国军方倾向于做最坏打算，目前正专注于与中国潜在的直接冲突，这增加了被其他威胁打个措手不及的风险。再次，中国已在全球软实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国已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积极填补了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削减开支留下的空白。最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尽管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但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的供应链联系十分广泛，而且中国还持有近一万亿美国国债。

当然，两国都有可能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外交是必不可少的。两国需要与对方确定自己重要的国家利益，双方都需要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 阿富汗撤军对拜登中国战略的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网站 8 月 25 日登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 (Michael J. Green) 等的文章称, 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使拜登转向在亚洲应对中国的努力复杂化。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很混乱, 但它不应改变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逻辑。美国人仍强烈支持保护亚洲盟友免受攻击。拜登政府当下的任务是就其亚洲战略提供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第一, 拜登必须承认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了。拒绝承认任何缺点, 只会加剧亲密盟友对美国基本作战能力的担忧。拜登应该响应呼吁对吸取的教训进行仔细评估, 以向亚洲盟友保证, 美国在下一次重大行动的规划、磋商和执行中不会重复这些错误。

第二, 拜登政府需要通过比原计划更多的演习和部署, 来展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威慑力。美日和美澳国防部长会议将于今年秋季召开, 必须尽快锁定军事演习、武器开发以及网络和太空等新领域的合作等议程。

第三, 在应对阿富汗危机时, 拜登政府需要打破其本能的大西洋主义。七国集团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会议的提议将帮助拜登政府走出困境, 但只有日本会把印太地区的观点带到谈判桌上。如果拜登政府想证明, 它是认真要把重心转向印太地区, 那么他应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应对中展现对亚洲盟友的重视。

第四, 拜登政府需要在该地区发挥重大作用, 以证明其战略承诺。拜登的印太战略迄今为止最大的缺口是, 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现在为 CPTPP) 后, 拜登政府并未提出任何涉及该地区的经济策略。拜登政府必须证明, 它不仅能够让美国人和美国的盟友撤出喀布尔, 而且正在加倍履行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 美对华“新支配性”战略难以奏效

美国卡托研究所近日召开美国对华战略为主题的研讨会，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约书亚·西弗林森（Joshua Shiffrin）在会上探讨了为何美国对抗崛起的中国并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战略注定会失败。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在冷战之后，美国一直推行一种所谓的“支配性战略”（primacy strategy），即美国利用自身的优势、携手国际组织或盟友，一同打压崛起的大国，比如纳粹德国和苏联。然而，这些战略其实并没有达到目标。今天，美国一些自由国际主义者提出的与中国竞争并继续维持美国在世界上主导地位的战略——西弗林森称之为“新支配性战略”（neo-primacy strategy）——难以奏效。

西弗林森认为，一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很难赶超美国，并且不会对美国国防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巨大的国际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在过去几届美国大选中，候选人都把美国内部矛盾转嫁为外部势力（俄罗斯和中国）的干扰，从而形成自欺欺人的思维，并没有真正看到美国国内的问题所在。

很多人认为，假如当年中国未加入世贸组织（WTO），或许美国可以一直稳坐头把交椅。然而，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与其他势力联合对抗美国，这可能会给美国制造更加不稳定的因素。加入世贸组织或许让中国更快地崛起，但今天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恰恰可以制约中国的军事行动，因为中国需要遵守国际规则，不能随意使用武力。

西弗林森进一步指出，同盟友合作与中国竞争是拜登的一贯策略。然而，今天的国际局势不同于 1999 年。如果美国试图用过去的策略来对抗中国，即使中国最终没能赶超美国，其他国家

也会关注到，中国正在广泛地加入国际组织和联盟。如果美国继续使用过去的对抗策略，可能导致美国更加孤立，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失去与中国在经济上合作的机会。

意识形态的竞争塑造了今天的中美竞争局势。然而，中国与美国并不是绝对的“专制”和“民主”，只是各自在某种程度上专制，在某种程度上民主。要求对方必须与自己的意识形态一致才与其合作，双方都难以共赢和生存。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竞争来达到其他目的，但美国人民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这样的竞争会让美国国内的民生受到损害。

### **葛来仪：美如何构建联盟对抗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外交事务》杂志（FA）网站 8 月 20 日登载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S. Glaser）等合著的文章称，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南海面临着一个难题：中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南海的现状，使之有利于自己。但自 2016 年以来，那些与北京存在海上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一直不愿对北京方面做出坚决的回应。

但近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马尼拉为美国重振在南海的政策提供了机遇。杜特尔特宣布撤销终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VFA）的决定。鉴于美菲《访问部队协议》暂时得以延续，美国和菲律宾的国防机构可以对安全合作和应急反应进行长期规划。随着杜特尔特定于明年夏天离任，两国的国防机构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打好基础，以便在杜特尔特继任者的领导下迅速实施美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EDCA）。

杜特尔特的转变也为束缚中国在南海行为的外交努力提供

了必要的动力。美国及其盟友现在应该更有信心，菲律宾不太可能为了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与美国断绝同盟关系，或牺牲其领土主张。

拜登团队一直在努力说服其他国家反对中国的主张，支持仲裁裁决。这项工作最初进展并不顺利，但最近马尼拉和河内在语气和策略上的转变，以及美国和菲律宾更密切的合作，可能会改变这一点。此外，欧洲也日益关注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

拜登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建立一个联盟，以提高北京在南海行动的成本。美国应该在国际论坛上就这一问题推动更有力的措辞。计划于今年秋天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峰会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机会。“四方安全对话”的海洋安全工作组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领导人层面的支持东南亚声索国的声明将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美国还应该继续推动菲律宾和越南发起的针对在牛轭礁的中国“海上民兵”的公开点名和羞辱行动。华盛顿应该争取其他地区 and 地区外行为体的支持，组建一支国际监督力量，以对试图“胁迫”其他国家船只的中国“海上民兵”船只进行识别和归类。在南海收集到的信息应该与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分享，以争取对参与“胁迫”行为的中国渔业公司及其在岸支持网络进行制裁的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外部行为体必须意识到，东南亚国家的攻击性是有限度的。它们在经济上太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而且缺乏让北京付出沉重代价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些国家的外国伙伴必须准备扮演“坏警察”的角色，允许菲律宾和越南向中国妥协。

## 美国外交

### 兰德公司为美与朝鲜打交道支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8 月 12 日登载该智库学者特洛伊·史密斯 (Troy D. Smith) 等执笔的报告, 利用博弈论对当下朝鲜半岛局势, 尤其是半岛无核化谈判进行了分析。

报告认为, 金正恩的最终目标可能有两种: 防止政权更迭或统一朝鲜半岛。美国的政策应更好地利用意在使金正恩明确其最终目标和动机的具体行动。朝鲜之前签署了三份有关核武器的协议, 但并未遵守其中任何一项。朝鲜、中国和其他参与者可能也很难相信美国会遵守其协议。基于此, 报告建议:

第一, 美国与国际社会应迅速设法采取行动迫使金正恩暴露他的动机是维护其政权还是统一朝鲜半岛。第二, 美国和国际社会应建立强有力的机制来执行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 并探索确保各方都能在长期遵守协议、并在违反协议时给予实际惩罚的机制。第三, 美国应确保中国支持任何有关朝鲜的战略, 并应努力使美中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一致。第四, 美国必须在与朝鲜和解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例如, 未来与朝鲜谈判的可能性, 以及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寻求核武器的激励效应。第五, 美国应该设定完全无核化的最后期限, 以及超出最后期限的后果, 因为随着时间推移, 朝鲜的核能力会不断增强。

### 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全球后果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多位学者近日就美国迅速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将引发的地缘政

治连锁反应进行了评估。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该智库高级研究员娜迪亚·夏德罗 (Nadia Schadlow) 认为，美军在阿富汗的失败将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喀布尔的混乱加剧了美国的衰落感。美国的联盟也因拜登政府的粗心行动受到了损害。

该智库兼职研究员罗伯特·格林韦 (Robert Greenway) 认为，短期内拜登政府的行动将削弱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维持威慑能力的信任。伊朗将坚持追求临界核能力。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以及成千上万被关押者被释放到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港和军火库，将推动全球“圣战”运动，他们将迅速恢复针对美国及其全球利益的外部行动，利用美国决心和领导力的空白。

该智库高级研究员约翰·李 (John Lee) 认为，美国对阿富汗遗留问题处理得很糟糕，并不代表在印太地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从历史、制度和物质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印太地区处于比在中东更有利的地位来实施领导力，它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盟友。北京会注意到拜登政府的失误，但知道美国的眼睛会紧盯中国。

该智库高级研究员彼得·拉夫 (Peter Rough) 认为，和在其他地区一样，在“民主与威权”之争中，拜登“美国回来了”的口号主要面向西欧。该口号的可信度已经支离破碎。美国在阿富汗的溃败会增加欧洲在最重要的事情——中美竞争——上走中间道路的可能性。

## 混乱的多边主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8 月 26 日登载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希瑟·康利 (Ayse Kaya) 的文章称，全球经济秩序正处于一个拐点，尽管不太可能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完全



逆转与多边机构的解体，但各国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将对新经济秩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混乱的多边主义”。文章摘要如下：

混乱的多边主义主要包含两个领域。第一个是“控制”领域，以各国试图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规则中夺回控制权为特征。因此，这将是一个变革的领域——要么就多边规则进行重新谈判，要么与现有规则脱节。第二个领域是“我们所知的多边合作”领域，各国将在现有多边机构的框架下继续努力开展合作，但“在合作中斗争”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这两个领域产生于并影响着现有局势，表明尽管多边秩序将继续是棘手的，但各国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将重塑它，从而产生一个由选择性和随意性合作组成的“混乱的多边主义”。

经济全球化在美国的分配后果日益突出，主要是美国高收入群体从中获益，使美国为经济全球化喝彩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美国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贸易冲击”，推动美国民粹主义政治候选人的崛起。美国必须重新就经济开放进行谈判，以减少国内不平等，遏制中国的崛起。此外，新冠疫情大流行进一步推动了“控制”领域，突显出所有经济体都容易受到各种关键行业和供应链依赖的影响。因此，预计各国都会加大努力控制市场。人们可能不仅会看到多边规则的倒退，还会看到对现有规则的重新谈判，或在涉及市场控制时制定新的规则。

有效的多边合作可以抑制“控制”领域的自助倾向，甚至为经济全球化的不良方面提供共同的解决方案。但美国领导人可能会发现，既要减少承诺，又要重新就经济体系谈判是很困难的。美国更可能以随意和选择性的方式回归多边主义，因为美国及其欧洲伙伴都专注于对内克服国内困境，对外寻求遏制中国的全球经济议程。

## 美应如何避免与中俄的两线战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8 月 22 日登载美国前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专注于大国竞争研究的智库“马拉松倡议”联合创始人韦斯·米切尔 (A. Wess Mitchell) 的文章称, 避免与中俄两线作战必须成为当代美国大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

文章称, 21 世纪美国面临的巨大风险, 除了彻底的核攻击之外, 是一场涉及其最强大军事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两线战争。这样的冲突有极大风险, 将对美国的影响力、联盟和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生存。

然而, 美国在理解这种危险及其将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何种影响方面行动迟缓。迄今为止, 华盛顿应对两线战争难题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 而关于如何开展外交来避免两线战争, 更广泛地说, 如何减轻战略同步压力的讨论则很少。事实上, 外交可以作为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重新安排力量以避免同时与众多敌人作战的工具。

当前, 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对对手进行排序。美国应该设法错开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 以确保其不会在一场战争中同时面对两者, 而不是试图同时遏制两者。随着中国将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更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对服从中国的恐惧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为美国外交创造了一个机会之窗, 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将助长俄罗斯的恐惧, 并增加其对战略替代方案的需求。

为此, 美国应当形成一个连贯的——但实际上是分叉的——俄罗斯政策, 一个重点放在欧洲, 另一个重点放在亚洲。美国在欧洲应对俄罗斯政策的主旨应是坚决抵制俄罗斯的扩张。相比之下, 美国需对在亚洲应对俄罗斯的政策进行调整, 以鼓励俄罗斯将注意力和精力转向东方。

这样的政策将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计划。在经济上，美国应该为其亚洲盟友和伙伴创造激励措施，以防止中国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获得经济垄断。在军事上，减轻对俄罗斯向印太国家出售武器的反对。这不仅可以消除美国与这些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摩擦，而且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引入新的摩擦点。在其他任何领域，美国都应当鼓励俄罗斯在亚洲的更多存在。

当然，这样的战略也有风险。要想奏效，必须紧闭俄罗斯向西扩张的大门。否则，两线作战的威胁最终可能会诱使美国试图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安抚或进行交易，甚至自相矛盾地使美国在军事上优先考虑西太平洋的能力复杂化。

## 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蓝图初现

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印太战略，但拜登政府的印太蓝图已经初现。拜登政府调整了最初对共同国家价值观的强调，以更好地与共同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拜登政府将于明年年初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为未来的印太战略提供指南。兰德公司就此发文称，在拜登政府对该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高层访问和线上接触之后，至少有三个关键点已经明确，为美国政府的印太政策提供了蓝图。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拜登政府将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共同的价值观置于与中国对抗这一共同的国家利益之上，引发了对这种方法可持续性的严重质疑。这是因为，整个印太地区的“威权主义、半威权主义、甚至越来越不自由的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关于价值观的说教和带有附加条件的合作。不过，拜登政府最近似乎对该说法进行了改进。此前，拜登政府将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与志同道合

的民主国家的合作上，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如今，拜登团队欢迎与任何盟友或伙伴合作，只要他们愿意真正追求共同的价值观。

最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重新定义了价值观相关讨论的性质，将重点放在所谓的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是完美的，以及所有国家都必须努力改善自己等方面。

第二，与前任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已将政策对话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否会与华盛顿结盟对抗北京，转向关注他们当前关心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新加坡时表示，“我们不是要求该地区的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的友谊“超越了地缘政治”。8月初，布林肯一周连续参加了五场东盟线上会议，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大多数的会议概要甚至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而是聚焦于其他地区挑战，如疫情救援、气候变化、人力资本开发、城市化和缅甸政变。

第三，虽然拜登政府坦然承认，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极限竞争”中，但这种竞争不应该失控。事实上，在上个月访问中国之前，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在3月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双边会谈后，呼吁在美中关系中设立“护栏”，并指出两国可在气候变化、朝鲜、阿富汗、禁毒、防扩散等共同关注的挑战方面进行合作。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中极限竞争似乎不再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印太地区国家可以认为大国竞争对它们的负面影响较小。

尽管没有正式的印太战略，但拜登政府对该地区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多可以察觉的地方。很明显，最初对共同国家价值观的强调已经做出了调整，以更好地与共同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特别是鼓励盟友和伙伴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华盛顿也终于承认了其盟友和伙伴所拥有的能动性，而不是单纯利用他们来赢得大国

地缘政治竞争。与此前的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似乎没有将美中关系推向悬崖的准备。

这些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积极进展。拜登政府表现出了灵活性、专注力和务实性。几十年来，美国因关注中东地区而不太重视印太地区。但由于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美国对印太地区重新产生了兴趣。该地区因此也感到紧张不安，一项稳定而周到的战略很可能会受到欢迎。

## 美国政治/其他

### 共和党人对美大企业和银行的负面看法加深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8 月 20 日载文称，共和党人对一些重要机构，从大企业和技术公司、大学、工会到公立学校对美国的影响越发持批评态度。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对一些机构和产业的看法比共和党人要积极得多。

和过去一样，一些最大的党派分歧集中在对高校影响的想法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大约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表示，高校对美国产生积极影响；而 64% 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人表示，高校产生了负面影响。党派差异也延伸到了对公立学校的看法：77% 的民主党人认为公立学校产生积极影响，但只有 42% 的共和党人持相同观点。

自 2019 年，认为大企业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共和党人的比例从 54% 下降到 30%，下降了 24 个百分点。而民主党人同期对企业的态度稍微变得更积极，积极的观点从 23% 上升到 28%。因此，虽然两年前在对大企业的评价中存在巨大的党派差异，但今天却没有明显的差异。在过去两年中，对科技公司、银行和金

融机构以及工会对国家的影响持积极看法的共和党人的份额也出现了下降。而民主党对这些机构的观点都变得更加积极。

在调查包含的八个机构和行业中，只有教会和宗教组织被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具有积极影响。相比之下，52%的民主党人对教会持积极态度，而46%的人认为它们有负面影响。

### 美军如何加强行动的不可预测性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近日发布研究报告《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威慑》称，《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要求美国军队在行动上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以帮助美国威慑对美国伙伴的攻击。但这种策略也可能产生副作用。

报告称，增加美国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只是加强延伸威慑的众多方法之一。现有信息表明，使俄罗斯和中国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行动不可预测是可能的，但代价高昂。增加美国行动不可预测性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宣传美国的新能力，并证明它们为美国实现其关键目标提供了多种选择。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比如降低美国的准备程度，增加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感知。

因此，美国应该将作战的不可预测性与威慑美国对手的替代方法进行比较；制定一个清晰的逻辑，将旨在提高美国行动不可预测性的活动与预期结果联系起来，并考虑潜在的权衡；审查现有的情报，考虑增加对俄罗斯和中国情报、军事规划和决策过程信息的收集；继续提升美国陆军和美国国防部灵活性和敏捷性的举措，这也可能增加美国行动的不可预测性。

## 美如何保持在微电子行业中的优势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近日邀请数位美国政界、军界、商界人士以及智库学者，共同就美国微电子行业的现状以及恢复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领导地位的战略展开了研讨。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国防与技术中心主任布莱恩·克拉克 (Bryan Clark) 认为，在芯片的产业链中，东亚国家的公司占据了一大部分，但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供应链进一步受到影响。为了应对此类风险，美国政府应当利用更加严格的审查过程来确保芯片生产过程的安全，以防某一方对芯片生产造成影响。

克拉克建议美国向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提供更多资金，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优势。例如，在芯片生产方面，三星和台积电是全球的主要生产商。如果美国想重新建立起自己的芯片生产线，那么其产品的成本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加大投入研发、提前布局下一代的芯片生产，并且准备将芯片商业化。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资金，精准地在重要领域进行资源部署。美国政府还应更加鼓励私营部门在这一领域发力。在芯片系统等可以使美国领先对手的技术上，政府应该出面引领投资，与私营部门合作，并让盟友加入关键领域，鼓励盟友进行技术创新。

美国新泽西州众议员米基·谢里尔 (Mikie Sherrill) 建议，美国政府应关注未来技术芯片系统设计、异型芯片构造等领域。这些技术如果发展得当，美国以后可能将在本土进行生产。如果美国希望这么做，那么人才和氛围的培养对于未来技术的发展就十分重要，设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维多利亚·科尔曼 (Victoria Coleman) 指出，美国与日本上世纪 80 年代争夺在微电子行业领先地位的

启示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必须团结起来，把研发摆在重要位置，政府也应该在该领域进行更多投资，并鼓励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和公司在该领域深耕。

## 美需制定一项太阳能制造战略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8 月 12 日登载该中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高级研究员尼科斯·察夫奥斯 (Nikos Tsafos) 等的文章称，太阳能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能源技术都要快。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在太阳能领域建立了制高点。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太阳能制造战略，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文章称，美国已经提出了数项太阳能战略和一些支持该产业发展的想法，但这些政策往往缺乏协调。美国需要继续成为太阳能的主要市场，并需要向私营企业传达需求很强劲明确信号。

创造需求的一般努力很少考虑使用了哪种技术、在哪里制造、美国工人获得了多少利益等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需要更仔细地确定干预措施的目标，关注供应链缺口、更清洁的替代方案和新技术。

影响供应链的一个工具是，看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并优先考虑低碳足迹的制造商。美国超低碳太阳能联盟正在推广生产标准，鼓励企业和政府支持低碳太阳能。这些计划应该得到鼓励和跨境协调。拜登政府还可以将嵌入式排放纳入其“购买美国货”的条款中，以在国内创造更多低碳太阳能需求。

美国还应投入资源，研发晶硅太阳能板的技术替代品。这不仅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还能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太阳能产业，其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薄膜



太阳能、聚光太阳能以及未来的钙钛矿，可能有助于供应链多元化，并为美国制造商提供新的竞争机会。

目前，政府对这些替代选项的支持大多限于研发，与其更广泛的供应链和清洁能源战略脱节。未来，政府有机会采取更多措施。例如，政府可以为薄膜太阳能和聚光太阳能提供更高的税收抵免激励；制造业税收抵免也可以关注这些替代能源，以鼓励地区集群。这些措施将鼓励技术多样化。

但是，美国无法独自重新安排全球供应链。它需要盟友和合作伙伴。进出口银行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可以瞄准新技术，以帮助降低成本、促进供应链多样化。美国不应强调无意义的回流，而应在不同地区用不同的技术推动供应链的多样化。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